

# 从明代耶稣会士活动看中西文化交流

刘小龙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上首次开始真正交流应是在新航路开辟后的明代(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1644年明亡)。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在传来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将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方,从而将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本文试图从理性角度分析这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如何化解这种冲突,进而达到融通。

[关键词]明代;耶稣会士;中西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2-0059-02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在欧亚两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希腊—拉丁和基督教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精神文化成果,直到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出于宗教热忱和献身宗教的精神,为了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中国,他们来到了中国。为了在传教中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消除中国人对西方宗教的疑惑,他们往往以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军事技术等近代科学知识作为传教的媒介,从而在客观上承担起西学东传的文化大使的历史使命。

## 一、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处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迫切需要发展海外贸易进行殖民掠夺,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东方成为其重要目标,欧洲殖民者纷纷东来,一大批西方传教士也来到中国。明代来华的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士。天主教耶稣会是西班牙人伊格纳修·罗耀拉1534年在巴黎创立的,1540年,该修会得到教皇保罗三世的确认,从此,它很快在欧洲发展起来,并开始了传教活动。当时,欧洲正经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面临危机的教廷正想利用耶稣会来收复失去的利益。耶稣会亦称“耶稣连队”,是一支纪律严明的传教队伍,由于它要担当起为教皇效忠的职责,其成员都经过严格的训练,这就使得它具有不凡的素质。事实证明,来华的耶稣会士绝大多数都是饱学之士,在文学、哲学、天文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实无愧于“西儒”之雅称。而他们来华之后,皆研习中文,钻研儒理,如马诺瑟对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并对治中国儒学独具见解:“盖理学也,固由经学而立,而经学也,必由字学而通。舍经斯理缪,舍字斯经郁矣。”<sup>①</sup>耶稣会士们来华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传教目标,它对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的科学甚至治学方法等,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 二、明代中西文化交流及其影响

在耶稣会士中影响最大的是利玛窦,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对明代西学东渐局面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582~1610年,利玛窦在中国的28年岁月中,携带西洋文化进入宫廷和士大夫群,在中国的士林名流中觅得知音,并能立足于中国上流社会,主要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他意识到他所接近的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已经具备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政治制度和学术名艺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看成野蛮人,而且是没有理性的动物”,<sup>②</sup>要想使西方的宗教思想被崇尚权威和正统思想的中国士人所接纳和理解,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他一方面尽力使天主教的礼仪适应中国的社会习惯,寻找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切合点;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尊重学问和知识的国度。因此,他在传教时尤其注重数理科学知识的传播,往往将西方的天文、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作为与中国官员结交的晋身之阶。正如他们所认识到的:“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的最初印象,与他们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密切相联,然而科学的卓越成就还具有另外一个效果,导致他们接受一个外国人新信仰所必须的谦恭,以便使这个傲慢的民族减轻其心理优越感的枷锁。”<sup>③</sup>基于以上认识和策略,使得他在西学东传方面能够取得很大成功。科学知识成为西方传教士开启中国士人精神世界的钥匙,也成为西学东传的引子。他与徐光启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被梁启超称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的佳译。梁启超认为,随着西学的东渐,“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明代传教士所传之西学,“在我国学术上,其影响不限于局部,而为整体者也”。可以说,近代西方的几乎所有学科,基本上都已介绍到了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西方传教士虽然是要播福音的种子,但最终开出来的

却是文化交流的花朵。明代的文士当中,有不少人信奉天主教,其中最著名的为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导致士大夫信教的重要根源是西方科学的吸引力,从16世纪利玛窦来华开始,耶稣会士在传布宗教神学的同时,译介了相当数量的有关天文、舆地、数学、物理、医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著作。有中文可考者,约计370种,属科学120种左右。“西学”这个词,正是伴随着这一活动而来的,从传教士一开始译介西学的同时,中国奉教的士大夫出于经世的考虑即予以积极合作。由于朝中保守势力的排斥和阻挠,这股西学东渐之风渐渐消失了,但却真实地反映出明清之际先进的中国士人,从华夷之见中探出头来接纳新知识的开明和勇气,为中国科技发展注入新的生机。

### 三、明代中西文化交流:从认同到融通

明代,中西文化就是在彼此有差异的情况下相遇并发生冲突,逐渐由冲突走向包容与发展。明代中西接触的最大成就是它为中国和西方这两大文明的对话开了一个好头,使得很多问题,包括双方的差异,都凸现出来了。同时,明代的那种互动对话模式本身,也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遗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去探索:

#### (一) 认同

所谓“认同”就是认为别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并因此而感到亲切;另一层意思就是“承认”、“认可”。文化认同可以是局部的认同,也可以是全面的认同。只有认同,才有可能交流。明代来华的传教士当中,很多人对中国文化是持认同的态度的。当然,认同也可以表现为“虚假认同”。随人变样的耶稣会士便常常采取这种虚假认同。利玛窦初到中国时,闭口不提传教之事,初以“西僧”自居,后以“西儒”自居,目的就是要证明,“我”跟“你”是同类,“我们”之间可以交往。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利氏的求同意识。所以,在异质文化交往中,就像误读不应被排斥那样,虚假认同同样有它独特的作用。认同跟认可相关,认同之后才能接受,才能赞赏,才能去借鉴。

#### (二) 融合

融合是异质文化交流的一种较高境界。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最典型的、最成功的文化融合之一当数佛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之间的融合。基督教在与希腊罗马文化砥砺了几百年后最后也相安无事了,我们决不能用“泾渭分

明”来形容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已经流着希腊哲学的血液。所以,一般认为,不懂得基督教,就无法认识西方文化。同样,“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前者说明基督教跟欧洲文化已紧密结合;后者说明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已经契入(主要是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的肌理。而且佛教已经演化到“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sup>④</sup>的地步。佛教跟中国文化之间的结合,不仅是在哲学、伦理、艺术等层面,甚至汉语中若剔除了佛教语言,它恐怕也会残缺不全。赵朴初先生甚至说:“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而“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佛教跟中国儒家文化融合,基督教与希腊-罗马传统的融合,可以看作人类文化史上异质文化融合的典范。

#### (三) 借鉴

借鉴就是将自身跟别的人或事相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即以他者为一面镜子。明代以基督教为媒介的中西交往,一方面使《几何原本》传到中国;同时,中国的“四书”、“五经”也远渡重洋出现在西方文化的地平线上。中国本是一个善于“借”的民族,连建园林时也忘不了“借”,故有“借景”之说。中国文学从佛教那里借来的东西很多,中国文学的想象力、中国文学作品的布局,甚至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兴起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发轫,都与佛经的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借鉴,毋需赘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有中国文化的推力。

#### (四) 融通

融通即一种比融合更高的境界。融通并不是要各种文明相互学习、吸收时牺牲自己的个性。犹太作家赞格威尔认为,融通即是各种文化在一个熔炉中融化而使得各种文化变成一种新的合金,即各种文化经融合而失去了它原有的形态和特性。但我们更赞成多元格局的世界文化像一个“色拉拼盘”。“在这个拼盘中,不同的成分保留其独特风味和形态,但这道菜作为一个整体有其被认可的自成一类的东西,它作为一种特别的混合物有其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在这个拼盘中,每样水果、蔬菜呈现出各异的形态、色泽、味道,只挑其中的一两样果腹,未必有益于健康,但它们合在一起则构成一道健康的佳肴。

#### [注 释]

①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

②③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

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95年版。

#### [参考文献]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6.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书店,1985.

[3]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下)[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5]意·翁贝尔托·埃科.他们寻找独角兽[A].乐黛云,勒·比松.独

角兽与龙[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赵朴初.俗语佛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胡适.白话文学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8]英·C·W·沃特森著,叶兴艺译.多元文化主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